

念吳叔微、追思稚老和蘅公

賴 景 瑚

故友吳叔微兄的遺孀李筱梅夫人，最近忽把叔微兄的許多遺物，包括他生前用過的書籍、字帖、銀幣、及其親手精製的機械零件，從紐約寓所掛號寄來，希望我這位他的好友，為她尋覓一個適當安置的地方，作為一種永久紀念。

經過旅台江蘇着宿余井塘和鈕長耀二位先生的安排，我把那些彌足珍貴的老友遺物，送請台北私立強恕中學陳列；因為那個中學是台灣的江蘇同鄉所設立，用以紀念江蘇先賢鈕永建先生的。鈕先生和吳稚暉先生是同時追隨 國父的革命同志，而叔微兄又是稚老的獨生哲嗣。我想他的遺物放在一個這樣有歷史淵源的學校裏，應該是 很妥善的。

這便引起我半世紀前和叔微在上海高昌廟兵工廠共事的一些回憶，以及我對那位一代賢哲吳稚老和他那位高風亮節的摯友石蘅青（瑛）先生的追思。他們父子及蘅公都和我的一生發生過前後不太相同，也不太尋常的關係；雖然我和稚老只在重慶時代有過若干次的接觸；我和叔微也不過在同一機關共事不及一年。事實上，我和他們父子各有一段因緣，都是由於蘅公的介紹。石先生和吳先生是同盟會時代的同志。有一個時候，中山先生在歐洲奔走革命，就是住在他們的倫敦

寓所。

我於一九二六年自美國留學歸來，雖然參加了國民革命的行列，也在廣州做了一年多的事；但我第一次得到一個屬於我工程本行的工作，還是在蘅公所主持的上海高昌廟兵工廠。那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，我被他邀請入廠為機械工程師，并協助他總辦全廠事務。我記得我開始工作的第一天，他便介紹我認識了十多位廠中的高級職員。其中一位最引起我注意的，就是相貌英俊，身體魁梧，年齡比我大幾歲的叔微兄。

他也是剛從英國回來，即被石先生所羅致的。他是電機（那時稱為電氣）工程師。我和留德的鄭點石是機械工程師。李伯芹是留日的冶金工程師。蘅公對我說：叔微雖在職位上是電機工程師，但他最擅長精密機械的製造，早已在英國有很顯著的成就。他又讓我認識了管理業務部門的熊亨靈、張有元、譚嶽泉、熊國藻等君。這也反映出那時上海兵工廠的人才濟濟和石先生的求賢若渴。

蘅公任職不過一年，由於他雷厲風行的整飭內部，大刀濶斧的促進生產，我們對於國民革命軍在那一階段的長足進展，的確盡了供應軍火的職責。我們那班充滿朝氣的青年工程師，居然在

那一段很短的時間，把一個歷史雖頗悠久，但設備却極陳舊的工廠，變成一個效率極高而能使北伐前線軍火不虞匱乏的兵工廠。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對國民革命的一點貢獻。

國民革命軍就在那一年多，完成北伐，統一南北。由於政治關係的變遷，上海兵工廠忽然奉命改組。蘅公和他那苦心組成的班底都離開了上海，勞燕分飛，音訊鮮通。只有我和蘅公始終保持經常接觸。他兩年後任南京市長，還要我當了三年多的秘書長。其他的同事大部份失去聯絡。我只聽見叔微生了一場很嚴重的病，不久由他的夫人伴往美國治療。我也不能從稚老及蘅公那裏，探知他的生活狀況。

我并不是因和叔微同事而知道稚老的。我對稚老的崇敬，自幼年時就已開始。我讀過他幾篇提倡「科學救國」的文章。他那「把線裝書拋到廁所裏」一類的偏激言論，很能激動那時一班想要救國而不知救國途徑的熱血青年。我之所以決心棄文學而習工程，便是受了稚老文章的影響。

後來國民黨聯俄容共，共產黨居心叵測，喧賓奪主，多方搗亂。國民黨還未開始北伐，共產黨即已釀成內部的分裂。國民革命軍從廣東打到兩湖，又因共產黨的阻撓，而幾乎功敗垂成。稚

老振臂一呼，就與張靜江、蔡元培等幾位先生，首先提議「清黨」，才挽救了那個不可收拾的危機。我對於稚老的真知灼見，大義凜然，真是五體投地的欽佩。

我在南京和衛公共事市府的時候，才經過他的介紹而認識了心儀已久的稚老，才聽了他許多快人快語，談話百出的妙論。我在對日抗戰的漫長歲月，雖在西北主持兩個大學，但每次因公到重慶，必去訪候稚老，和他海闊天空的聊天。那時他住在一只離國民政府不遠的雜貨店樓上。他在一間既狹小而又髒亂的房子，接見賓客，談笑風生，毫無侷促不安的樣子。

他房門上有他自題的「蝸廬」橫額。房內牆上有「斗室」二字，也是他自己寫的。事實上，那間小室不但是他的書齋及會客室，而且是他的廚房、飯堂和睡眠的地方；一隻陳舊的書架上，擺了一大堆的書報。他小床側一張長方桌的抽屜裏，就放置碗筷一類的飲食用具。

蔣總裁對吳先生一向是非常尊敬的。他當然不願看見這位亦師亦友而又對黨國有大貢獻的老同志，過着那麼簡樸清苦的生活，曾為他在重慶南岸山上蓋了一座小洋房。但稚老始終不肯遷過去。他還很幽默的對人說：「豬欄住豬圈便很舒服，一住洋房就會生病。」他就是那麼一位落拓不羈而不重視物質生活的人。他後來在上海及台北的居處，雖然比重慶時代好一點，但也不是太理想的。

我於勝利後還都，仍只聽說叔微在美養病未返，并不知道他在美國何地，也不知道他的病狀

有無進步。我於一九四八年因事到了紐約，忽從朋友口中，探明了叔微的住處，當即登門訪問，并和他的筱梅夫人初次相見。我發現他已不是二十年前上海時代的翩翩少年。他不但老了不少，而且精神萎靡，病容滿面。可是，他看了我，還是十分高興。他略言他的病況及他和我分別後的生活情形。他講到我們滬濱同事時的歡樂，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。他講的仍然是一口帶着無錫鄉音的滬語。從他的談話中，我所得到的印象，似乎他最初患的是腎臟炎，後來不知怎樣轉變為羶丸結核症；曾在上海日人所經營的福民醫院施手術，竟為日籍庸醫所誤，而染上了終身不治之疾。

他和我會面不久，就由紐約的曼哈頓區遷至皇后區的林山鎮。我們兩家相隔不遠，因而常相過從。那時我在聯合國服務，他喜歡和我談談國際局勢，尤其念念不忘在艱苦奮鬥中的祖國。筱梅夫人是李濟琛的女公子。他倆並沒有因兩家政治背景迥異，而有絲毫隔閡。相反的，他倆同艱苦，共患難，伉儷情深，與日俱增。筱梅夫人治家侍疾，勞怨不辭，含辛茹苦，數十年如一日，親友看了無不感動。

叔微罹此重病，自然不能出外工作，故其經濟情況，總有一點「捉襟見肘」。好在那位身體健壯，曾在康奈爾大學畢業的筱梅夫人，一面出外工作，一面在家侍候丈夫，居然撐持了那許多年。後來他們遷入山林區的寓所，我發現他們的生活環境突然大為改善。筱梅乃向我說出一位英國友人對他「雪中送炭」的一段扣人心弦的佳話。

那位英國友人是叔微在英求學時的同班同學

。他們同讀機械工程，同研精密機具的製造。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，相約畢業後共同從事機械工程一類的企業。叔微回國以後，初則因時局動盪不安，後又因身患重病，始終未能發展他的抱負。可是，那位英國同學却在英國一帆風順的在工程企業上，建樹了一番事業，也獲致了相當的財富。

他因經營國際貿易，經常往來英美之間，忽然一次發現了叔微在紐約的住處。他一看見叔微長年臥病，經濟拮据，他就立刻援之以手，不但給予叔微緊急的接濟，而且還為他們夫婦想出一個比較長遠的安家辦法。他在那相當清雅的山林住宅區，買了幾幢古色古香而有一點英國風味的公寓房子，請他們夫婦遷入一所自用，并以其其他幾所出租；即以租金所得，掃數移作吳家日常開支的用途。這樣古道熱腸的朋友，求之中國亦不可多得，不意竟出於重物質而不講道義的英國。這真是難能可貴的。

叔微夫婦便是這樣在那恬靜幽雅的山林區很舒適的住了若干年。我和內人常往訪候，一談就是數小時而不倦。我每次返台省親，或赴歐旅遊，一回到紐約必首先去看他們。他必殷殷詢問祖國情況和我對國際形勢的觀察。他有一次特請筱梅夫人選購了一座極精緻的枱燈送給我們。我到現在還擺在我的客廳；每次我一開燈，就好像看見了叔微的英影，那是他留給我的永久紀念。

他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卒於紐約，享壽六十六歲。當他病危之時，群醫束手，我還請了我的堂兄斗岩醫師助診，但惜病入膏肓，回天無術，他

便是這樣很安詳的實志以歿。筱梅夫人抑制了無限的悲哀，很鎮靜的料理喪葬諸事，有條不紊，令人敬佩。

中央黨史會存有 國父和吳稚老及叔微父子在倫敦吳寓所合攝的照片。我特託好友吳伯卿先生爲我複印一幀。那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稚老於民國二十八年中央訓練團闡述「國父行誼」，講到同盟會時代 中山先生旅遊歐洲的故事，便有如下一段的敘述。他說：「一九〇五年，總理四十歲。他春天從法、比、德三國到英。其時我正在倫敦，他打聽到了我的寓址，特別來看我。我發現他是一個很誠懇而又平易近人的紳士。我一見了就觉得他很偉大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這種不能以言語形容的偉大，稱作自然的偉大，最爲適當。他那次是因法、比、德三國留學生加入興中會而來。那年秋天，同盟會才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。」

稚老對辛亥武昌起義，也有一段關於 總理行動的描述：「辛亥革命起了。總理從美國經過英國東歸。他同李曉生及朱卓文同船回國。我同石衛青因爲要往柏林繞一繞，再轉到義大利上船；所以比 總理遲了一班。我們是那年十二月卅日到達上海的。那時 總理已被選爲大總統，一月一日在南京就職。我於一月四日到南京去看他，他就留我在總統府他的房裡居住。他在外面一間辦公，也在那裏會客；常到那裏幫助他處理公務的，有胡展堂和廖仲愷。」

我們不但覺得 總理不因身爲一國元首而改變革命領袖的風範，而且也認爲稚老不因老友尊

榮而改變他那落拓不羈的風度，均屬難能可貴。事實上，稚老一生做人行事，都是保持那樣的一貫作風。有人以爲他玩世不恭，也有人以爲他沽名釣譽。那是不公平的批評。他視榮華富貴如敝屣，從不重視他個人的日常生活。他在英國求學的時候，便是和石瑛先生住在靠近貧民窟的地區。中山先生過英返國，就在那裏寄居，也一樣的安之若素。我們今天看見他和稚老父子合攝的小照，仍可依稀看出那間屋子的簡陋及傢俱的窳舊。他們都可以稱爲安貧樂道之高士。

石先生被選爲第一屆中央委員，當然是由中山先生提名。但他兩次出長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兵工廠（廣州石井及上海高昌廟），都是爲稚老所推介。他們兩人不但是肝胆相照的老友，而且稚老非常佩服衛公的道德學問，深信他真是科學救國的長才。所以，當石先生在渝逝世時，稚老就親自做了如下的一幅輓聯：「抱建造現代國家之才，未能一試，」得留遺超人風節而逝，自足千秋。」

那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廿六日，我們一班衛公的親友和學生，在重慶下城夫子池，舉行了一個規模宏偉的追悼大會。蔣總裁親臨禮堂致祭，極盡哀榮，我還洽請中央、掃蕩二報出了「追悼石故委員衛青先生特刊」。稚老和居覺生先生都各寫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哀悼文章。我也附驥的寫了一篇「悼念石衛青先生」。我還記得居先生

在祭文中稱他爲「衛青六弟」，大概他們幼時曾換帖爲結拜兄弟的。我們因爲得到稚老的鼎力支持，才把那個追悼會開得很成功，尤其是 蔣總

裁的參與，更增加了追悼氣氛的肅穆和大家對於衛公風範的懷念。

稚老爲寫那篇「哀石衛青先生」一文，特復我如下的一封信：「景瑚先生勳右：昨拉雜草成哀悼衛青先生一千餘字，曾得石先生治喪處通知，將於廿七日，在中央、掃蕩兩報發行特刊，今特抄奉斧削，或可附載補白，即請便飭帶交太平門湖北省銀行爲禱。弟因日內尚有瑣事，未能趨叩。當於廿七日上午，在夫子池侍教可也。匆叩道安。弟敬恒頓，廿三日早。」我到現在還保存這張稚老親手寫給我的真蹟。這是不太容易得到的稚老墨寶。

衛公和稚老父子都已先後作古，我今天因筱梅夫人捐贈叔微遺物而寫這篇悼念之文，真是感慨萬千。我和稚老父子相識，乃由於衛公的介紹；而衛公之由教育界捲入政治漩渦，則係由於稚老的敦促。稚老及衛公均爲早年加入同盟會，而復親受 國父耳提面命的革命同志，也可以說是建立民國的革命元勳。我以後知後覺的留美學生，爲要滿足求學時期「投筆從戎」的壯志，居然於北伐前後加入革命陣營，既獲叔微爲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又得兩次追隨衛公，爲國效勞。受了他的薰陶，又得了他的提掇，不能不認爲這是我一生莫大的幸運。

七〇、六、廿六、台北

